

东汉文人的日常生活

《古诗十九首》在叙写自我遭遇之“怨”的同时，却也表现出了一个时代，表现出一代文人士子的精神面貌。

□ 撰稿 | 王 淼

所谓《古诗十九首》，原是汉代无名氏诗作的结集，最早收录于南朝萧统编辑的文学总集《文选》中，为中国古代五言诗体的发轫之作与乐府古诗文人化的重要标志。非止于此，《古诗十九首》同时又深刻地反映出汉朝、尤其是东汉时期的社会现实，反映出东汉时期的文人对个体生存价值的关注，对生命的反思，以及对自身日常生活的描述。《古诗十九首》既非一人所作，更非一时之作，既在汉代社会流传已久，又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胡大雷教授的《岁月忽已晚》，即是一部全面解析这十九首古诗的社会意义和艺术特色的著作。

汉代社会发展到东汉后期，政治上的腐化和堕落逐渐达到顶点。世家大族纷纷崛起，外戚和宦官则交替专权、相互倾轧，社会上卖官鬻爵、贿赂公行成为常态，一批重要的朝廷官员因为敢于直言而遭到惨杀，普通士人更是歧路徘徊、苦无出路。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士人深受苦闷、失意与沉沦的情绪所困扰，曾经的希冀与向往渐趋渺茫，郁积已久，最终发而为诗，这就成就了包括《古诗十九首》在内的无名氏诗作。这些诗作的主题，其最大的特色就是“杂”，即所谓“不拘流例，遇物即言”，时代的哀愁和苦闷可以写入诗中，个人的悲欢和牢骚同样可以写入诗中。

从内容上看，《古诗十九首》大抵可以分为文人的宦宦生涯、爱情生活、生命意识和友情交游四个部分。文人的宦宦生涯一般是从告别家乡、负书远行开始的，游宦者的目的地大多是城市，他们远离故土，远离亲人，既享受到繁华的城市生活，同时也不免产生故土之思，“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所写及的就是这种离情别绪。《古



《岁月忽已晚：古诗十九首里的东汉世情》
胡大雷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3年11月

书讯

《帕斯捷尔纳克抒情诗全集》

帕斯捷尔纳克的创作纵贯20世纪俄语诗歌半个多世纪，至20世纪下半期，他和阿赫马托娃成为白银时代大诗人中仅有的两位依然留在苏联并坚持写诗的人。无论就创作时间之久、创作精力之强而言，还是就诗歌风格的独特和诗歌成就的卓著而言，帕斯捷尔纳克都是20世纪俄语诗歌中的佼佼者。

译者从俄文版《帕斯捷尔纳克诗全集》中译出其中所有抒情诗，为更清晰地体现抒情诗创作的过程和全貌，译者并未完全遵循原版目录，而是将帕斯捷尔纳克的九部诗集按出版时间的顺序排列，并将帕斯捷尔纳克未收入诗集的诗作悉数列入最后一辑。

诗十九首》中写到的爱情，大都是男女双方不在同一场景中的情感表述，比较典型的像月下相思，梦中寄情，投桃报李，鸿雁传书，既经历着牛郎织女般的银河间隔，却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表情达意，可谓写尽了各种各样的相思之苦。东汉文人的生命意识，原是基于光阴荏苒、生命短暂的基础之上的，他们对生命最大的感慨，就是“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当一切无望、千岁之忧无法解决时，只有秉烛夜游、及时行乐。东汉文人讲究交友之道，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只有觅得知音，才是值得一个人好好活在世间的理由……

书中谈及的两个细节颇有意思，一个取自曹丕的《与吴质书》，写的是曹丕原以为可以与一些知己好友“长共相保”，享受人生。不料一场疫情，竟然使得这些知己好友在短短“数年之间，零落略尽”，曹丕悲痛忧伤之余，徒生人生无常之叹。另一个取自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写的是曹丕的友人王粲去世，曹丕前去吊丧，因王粲生前喜作驴鸣，曹丕便提议同行者“可各作一声以送之”，于是，同行者皆作驴鸣。从这种别致的悼念方式中，既能够看出文人之间的深切友情，亦可见彼时文人挥洒自如、不拘形迹的个性。

毫无疑问，《古诗十九首》的确奠定了五言诗在诗史上的地位。然而，更重要的是，《古诗十九首》在叙写自我遭遇之“怨”的同时，却也表现出了一个时代，表现出一代文人士子的精神面貌。诚如胡教授所言：“我们以‘岁月忽已晚’作为《古诗十九首》的情感抒发核心，进一步说，‘岁月忽已晚’成为东汉文人追求，挫折，再追求，再挫折，而希望仍在、追求不止的一种象征！”